

“汉学主义”：反思汉学的知识合法性

周宁

《东方学》提出的问题，是汉学无法回避的。汉学究竟是一种真理形式或科学，或者，只是一种叙事，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特色的叙事？反思汉学的知识合法性问题，有可能发现近年来随着“汉学热”出现的一种新的学术殖民化动向。

—

汉学表示学科，“汉学主义”则表明该学科的意识形态或话语特征，表明其知识包含着虚构、协调着权力，类似赛义德使用的“东方主义”。广义的西方汉学，最初很难说是科学或学科，它指西方拥有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甚至可以追溯到蒙元世纪旅行者的著作。欧洲的中国知识，或想象，有三种来源：商人水手的传闻、官方使节的报告、传教士的书简。商人水手的传闻大多难以置信，官方使节的报告不仅稀少而且片面，只有传教士的书简似乎还可靠一些，为西方汉学奠定了基础。广义的西方汉学作为一种“知识”，从来没有摆脱异想天开与异国情调的“想象”，传教士的汉学研究实际上是神学研究，而恰恰就是这些“索引派”著作，奠定了西方汉学的基础。

追索汉学的学术谱系，西方汉学从一开始就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它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汉学包容在汉学主义中。早期西方汉学经历了一个“赋、比、兴”阶段，“赋”指关于中国的信息大量的介绍铺陈；“比”指牵强比附中国与西方；“兴”指借助被美化的中国形象，表达自己的宗教或世俗理想。传教士美化的中国形象成为哲学家启蒙批判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中国的道德政治或开明君主典范。汉学被绞进启蒙文化的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东方专制主义，汉学成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汉学参与启蒙文化建设，最终成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塑造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回顾西方汉学的历史，是反思“汉学主义”问题的根据。文艺复兴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启蒙运动则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启动西方的世界性扩张大潮，启蒙主义者跟在冒险家者后面，在观念中进行“知识扩张”，他们以培根的经验主义与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为思想武器，试图为整个世界各个民族构筑一个完整的图景，并将其置于一种理想的时空框架中：世界的空间是二元的，分为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以地中海为界，东方扩展到太平洋，西方扩展到美洲。世界的时间是三段式的，过去、现在、未来，以线性历史的方式从过去发展到未来。正如旅行在时空交错中进行，观念中的世界秩序也在交错的时空中进行。西方是自由民主、理性进步的，东方是奴役专制、愚昧停滞的。

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可能从汉学等东方主义学科中获得“正义性”。在启蒙大叙事中，汉学界定的中国形象成为现代性的“他者”；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在此汉学已经不仅表述知识，而且表述权力。因为一旦确立了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

的对立观念，并肯定民主消灭专制，文明征服野蛮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就获得某种似是而非的“正义性”。

二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虚构与想象，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指西方现代学科体制中东方学内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研究，被假设为一门严肃严谨客观真实的科学，似乎无关于功利与权力。但是，即使在汉学成为“科学”或“学科”时，汉学也难免意识形态因素。狭义的汉学在西方现代性知识与权力的总体秩序确立之后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其中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深奥冷僻的汉学有什么研究成果，而是汉学学科的意义生产的原则、制度与基本假设。

首先是汉学研究的基本假设。经典汉学研究的是古代中国，纯粹文本中的中国。这种学科假设的真正意义前提是，中国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没有现实性的国家，一种已经死去的文明。这种理论假设并不来自汉学本身，而来自黑格尔的哲学或汤恩比的历史学之类的一般社会理论甚至庸俗社会进化论。我们在汉学的理论前提与同时代的西方意识形态之间，可以发现某种相互指涉关系。

其次是汉学的学科体制。后现代主义质疑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汉学的知识合法性自然也受到威胁。汉学在西方的社会科学学科体制中，属于东方学。其所在的社会科学体系六大学科的建制有时间向度也有空间向度，有地缘政治时空向度也有永恒时空向度，划分这六大学科的时空向度不统一，暴露了隐藏在学科体制中的意识形态或话语因素。解构汉学的基本假设与学科体制，揭示了狭义的学科化的汉学的“隐性意识形态”，汉学主义的问题再次凸现出来。东方学学科下的汉学研究中国的实际文化效果，不是接近中国，而是从文化时空中“疏远”、排斥中国，为西方现代性“大叙事”提供“文化他者”的形象。

“中国研究”往往强调它与传统汉学的不同，一个研究死去的文本的中国，一个研究活着的、现实的中国。这种研究假设否定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否则同样研究中国的学术，为什么分为传统汉学与中国研究？而一旦否定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也就否定了中国文明的认同基础。中国拥有的现实性或者是虚幻的，或者不属于中国。表面上看“中国研究”假设了中国的现实性，实际上却肯定了传统汉学的假设。中国文明的确是一个死去的文明，传统汉学有其合法性，西方冲击下经过革命后的中国，是另一个中国，需要另一门学问“中国研究”来对付。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中国研究”则以美国为中心。在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下，现代中国不仅是另一个中国，而且是西化的中国。

西方学科化的、“隐性意识形态”的“汉学叙事”，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中国研究”。回顾西方汉学的历史，证明汉学作为一种西方塑造文化他者的话语，本质上具有“汉学主义性”。如果将西方汉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前学科阶段、学科化阶段、后学科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应出现的是汉学早期显性的意识形态阶段、隐性的意识形态阶段与现代若隐若显的意识形态阶段。

三

汉学究竟是知识还是想象？究竟是“真理”还是“神话”？究竟是一个科学学科，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西方的中国研究某一个时期出现想当然的误解或虚构，尚可以就那段历史讨论那段历史中的具体问题，如果这种误解反复出现，不同历史时期虽然有所变化，但大多不外是些感情用事、一厢情愿的想当然的虚构，那么，值得怀疑的就不是某一个时代西方汉学，而应该怀疑西方汉学或中国研究这一学科或知识领域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或许汉学的所谓“客观

的认识”这一假设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汉学更像是一种叙事，一种能动主动地选择、表现、结构、生成意义的话语，其随意性并不指涉某种客观的现实，而是在特定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下创造表现意义。

东方学既是一个学科，一个以地域划分的研究对象确定的奇怪的学科，又超出一个学科的意义变成“主义”，成为西方“改造驯化”异域、认同自身文化的话语策略或权力工具。汉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他者的话语，本质上具有“汉学主义性”。如果将西方汉学史分为三个阶段，前学科阶段、学科化阶段、后学科阶段。前学科阶段的汉学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尽管与殖民扩张没有直接联系，但隐含在“发现”观念中的文化霸权，已经出现了，因为拥有关于异域的知识的同时已经拥有了某种关于异域的权力。学科化阶段中汉学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不易察觉，但后现代主义学科解构与东方主义理论提供的分析模式，已经揭示了最纯粹的学术与最功利的殖民扩张之间的隐秘的协调关系。“中国研究”出现，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一方面是汉学学科本身反思性批判，一方面是更彻底的意识形态话语。汉学的汉学主义性，贯穿始终。

汉学的“汉学主义”性，贯穿汉学史始终。而且其知识合法性危机，不仅限于西方汉学，还可能危及中国对西方汉学的译介研究的学术理念，甚至可能质疑到中国学术的合法性问题。西学中的汉学在中国现代观念的起点上植入中国学术，于是，中国不仅进入了一个西方中心的政治经济的世界秩序，也进入了一个西方中心的学术观念的世界秩序。这是20世纪初的事。21世纪初，西学与汉学再次成为中国的“显学”，在中国的“知识场域”中，由于缺乏学科批判意识造成的“自我汉学化”与“学术殖民”，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紧迫的问题。

必须警惕汉学与汉学译介研究中的“汉学主义”！如果西方汉学是某种真理的形式，那么中学西学的界限就没有意义了，可是，倘若作为西学的构成部分的西方汉学，本身是一种体现着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那么，西方汉学与中国国学就不仅有必要区分，还必须假设竞争、冲突、批判与超越。否则，一味译介与接受西方汉学，就可能使中国学术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殖民工具。实际上现代汉学主义是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汉学”正在塑造“国学”。学科反省是必要的。“汉学主义”批判动摇了汉学的学术根基。现代学者的文化使命，不仅要时刻保持一种文化批判意识，还必须有意地为他所属的学术领域提供合法性证明。